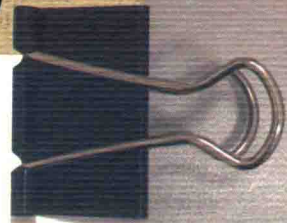


张心科◎著

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

# 经典翻译文学与

# 中小学语文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

# 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

张心科◎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张心科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675-9055-7

I. ①经…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②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I046②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8621 号

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

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

著 者 张心科  
责任编辑 刘 佳  
审读编辑 陈成江  
责任校对 张 箐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055-7  
定 价 4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2007年,心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早在2005年,他就已经出版学术专著《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其中的很多篇章在那以前就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面世,受到了一些学者和一线教师的重视。到北师大后,心科一头扎进了师大图书馆的书库,因为这里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历代教科书馆藏,清末民国的部分尤其蔚为大观。如今回想起来,心科在读博的这些年里,和这些教科书打交道的时间恐怕要远多于和我这个导师打交道的的时间。

心科的勤奋很快得到了回报。2011年,心科的博士论文经过打磨后以《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为名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甫一出版,便得到诸多儿童文学和教育学专家的好评。更多的读者知道心科,多半也有赖于这本书。事实上,当初在审定他的博士论文原稿时,很多专家都已经预见到了,这份博士论文材料翔实、考辨精审、视野开阔,出版之后势必成为后来人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如果读者朋友尚未读到心科的那本书,我倒是很建议您找来翻一翻,看看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能将史料挖掘到何种程度。

不过,勤奋是学者的本分,但一个好的学者从来不能够只骄傲于自己的勤奋。史料好比砖块,即便贪婪地占有了满地的砖,但如果不经独具匠心的层层拼搭,依然造就不出宏伟的建筑。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心科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从他极为熟稔的大量史料之中,抽绎出一些更具学术旨趣的线索,进行一些更有学术深度的反思。

毕业之后，心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相隔京沪两地之后，除了一些学术会议的机缘之外，我和心科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心科写成的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我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读完心科的论文，关注他在更多领域进行的各类研究。我明显感觉到，心科在深入爬梳史料的同时，还在进行一些更艰难的探索性学术工作。

今天，他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部分成果汇为这套五卷本的“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丛书，使更多的读者可以借此综览他这些年来在这一领域付出的努力和结出的果实。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再版的《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如前所述，这本书初版于十多年前，但今天读来并无陈旧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这套丛书的灵魂所在。接受美学是德国人开创出来的文学理论流派，如同心科在书里所言，这套理论极大地扭转了我们关注的重心。过去是“知人论世”，想要把握作家在创作时的“原意”；后来变为了“以意逆志”，要从文本细读中挖掘出深刻的意味；而到了接受美学这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读者”。确实如德国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任何一部作品，倘若不经过读者的阅读，就无异于沉默在纸张上的油墨符号。不过，不同的读者是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和阅读期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这就给文学作品的阐释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和难以准确估量的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过去的阅读教学，很像是“作家论”和“文本论”强扭在一起的结合，而要让“接受美学”顺利地“被”语文教学界“接受”，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心科当时就认识到的那样，接受美学的背后，要牵动教学目标的设定、教材的编写、教学过程模式的调整以及考评方式的变化，可谓错综复杂。近些年来，语文课程改革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和心科当初的设想是一致的，读者朋友如果仔细读读心科的这本书，会对这些年的语文课程改革工作背后的学术理念有更多的理解。

《经典课文多重阐释》则是一部典型的、贯彻了“史论结合”这一原则的著作。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心科用丰富的教科书史料呈现了一些经典课文在不同时代教材编选者眼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一个很简单但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道理是，即便是同一篇作品，也会因为时代的流转变迁而在读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对它的褒贬都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譬如，这本书里谈及白居易《卖炭翁》的一章就颇给人以启发。在今天，《卖炭翁》固然被视作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名篇，但在晚清民初，这首诗却一直未能被选入教材。晚清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偏重“经”和“文”，“诗”的部分明显不受重视。及至民国初年，“诗”在教材中的比重稍有抬头，但白居易却是以“嘲风月，弄花草”的《画竹歌》等诗作入选。心科敏锐地发

现,这背后有一个俗雅的转变问题。在当时人看来,教材诗文的选择务求“清真雅正”,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还是所谓文言与白话、雅与俗的理念对峙。白居易是大诗人,教材里不选说不过去,那么对当时人而言,要选也应当选择其文辞雅驯之作。在心科看来,要到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分别发表后,教材编选的标准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俗文学,又或者说,白话文学,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尤其在推翻文言文的绝对正统地位之后,为了创造新文学,胡适等人创造性地利用传统资源,将《新乐府》理解作“很好的短篇小说”搬了出来。1919年,戴季陶将白居易的文学评价为“平民的、写实的、现代的”,这几乎就像是在说,《卖炭翁》是唐人白居易比照着近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标准写出来的。随着这种雅俗认识的变化,1920年,《卖炭翁》的篇名才开始出现在了教科书中,并且逐渐和我们今天对白居易的普遍认知靠拢了。对《卖炭翁》命运的这一认识,是不可能完全从陈旧的教科书里窥得的,心科还需要对当时整体社会氛围和学术思潮的变迁有敏锐的洞察才能够捕捉到。我认为,这些地方就是心科的创见所在。

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一书时都会感觉到,为了阐明教材编写者在选编《卖炭翁》等知名选文时的考量,心科需要综合考察整套教材的“序言”、“编辑大意”、选文所在单元的结构安排、课后的“指点、发问”等,并且时时和课堂外的社会氛围、历史发展进程、学术史上的一些公案进行对话。我几乎可以想象,心科一定是一边在图书馆里反复琢磨着整套教材,玩味其中旨趣,一边写下这些论文的。扎实的史料功夫和敏锐的思考合于一处,才能推动心科的研究。

《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与前一本书当属姊妹篇,但似乎又要更精巧一些。心科在这本书里只选取了九篇(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考察它们在清末民国教科书中的呈现,但是每篇(部)其实都指向了某一类特定的文体、语体、题材抑或主题,讨论一个甚至两三个语文教育的重大问题,乃是一种以小窥大、见微知著的写法。心科自己最看重这一本。

其实我更希望读者朋友们关注的,是心科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这篇前言比心科别处的文字都多了一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心科想要追求的不是一些故弄玄虚的“上位”,而是一种更扎实,但同时更精巧的“方法”:“绣女绣了一幅织锦,木匠造了一个小亭,除了要绣得美、造得巧可供人观赏、歇息外,如果再告诉别人这么做的目的,并示人以自己所用的‘金针’和‘规矩’,也许更有价值。”这种宗旨其实贯穿在《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盼望读者朋友能够仔细体察。

在这方面,我倒是很愿意提及一本对我们语文教育圈子刺激不小的日本学者

的著述,那就是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本书的日文版是1997年出版的,2002年就被译为了中文出版,2013年又再版了,可见来自读者的反馈是不错的。藤井省三的书开创了一种研究“范式”,用一篇课文,以及围绕在这篇课文周边的讲解、习题、问答等阅读史材料,来窥视“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应当承认,这一范式是成功的,带动了日后众多的模仿者,也多多少少形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心科自己也坦承,藤井省三“别开生面的立体视角,扎实的文献功夫,让人顿生敬意”。但心科更坚定地认识到,照搬藤井省三的阅读史研究方法,不可能给研究带来任何真正的突破。因此,虽然心科可以在某些方面搜集到比藤井省三更多的材料,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在“量”上和藤井省三的研究进行碰撞,而是力图在“质”上有所超越。如果说藤井省三着眼的是“文学空间”,那么心科所着眼的明显是“教育空间”。我现在尚不能决然判断心科的这种尝试是否完全成功,但是他这种研究姿态是我所欣赏的。

《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是这套丛书里读来很有趣的一本。很多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域外故事,往往因为我们太过熟悉,而不会留意到它们传播到中国来的具体过程。心科以教科书为渠道,将这条原本若隐若现的“文化丝绸之路”展现了出来。我们可以借心科的研究增进很多具体的认识。譬如说,教科书编纂者对《皇帝的新衣》的认识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向中国介绍安徒生的孙毓修,就认为这篇童话的主旨乃是“赞新装之奇异”,而且明显是对照着中国传统的《聊斋志异》去理解它的;之后的《新学制国语教授书》则认为这篇童话“旨趣在做国王容易受人蒙蔽,不如做平民的好”,和“五四”之后文化界盛行的反对封建统治、追求平民教育、宣传劳工神圣等思潮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再往后,叶圣陶通过续写这个故事来“批皇帝之虚荣”;到了1937年的《高小国语读本》,对这个童话的阐释就相对比较完整了,并且突出了赞颂孩子率真的一面。

相较于用本民族母语写成的作品,翻译文学要经由更复杂的甄选、翻译、剪裁、诠释的过程,换言之,教材编选者在其中发挥的直接影响会更为突出,这其实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更多的、亟待发掘的亮点。心科写《最后一课》《项链》等经典篇目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其实是找准了很多近代教育史上的亮点,这就使得整本书变得有趣起来。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与前几本书又稍有些不同,不是对几篇不同文本的分述,而是将笔墨集中于一部分量足够的大书,考察其在百年语文教育史中的呈现面貌。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带动不少同类型研究的相继出现。

众所周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尚在创作过程中就被人们竞相传抄的文

学经典。然而,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么一部妇孺皆知的小说要经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一直到1924年才进入中小学教科书之中。这当中涉及到实用文言散文一度的统治地位、白话文的崛起、统一国语的进程等多个方面。即便进入了教科书,不同的时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心科将这个过程细致梳理了出来,我认为这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和语文教育的关系的认识。这就是心科所总结的“一篇文学文本只是自然文本,一旦进入教科书就变成了教学文本。作为自然文本,可能仅是供获取信息的文本或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作为教学文本又因为不同学段的教学目的不同、不同编者对其认识不同,所以编者所呈现出来的解读结果不同;又因为经典文本本身是一个充满着空白点和未定性的空框结构,而文本所承担的教学功能以及编者的知识水平、解读角度的不同,所以解读结果也不同”。

心科这套书是高度成熟的作品,但也绝非十全十美。因为很多章节过去都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诸如介绍《奏定学堂章程》、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往往需要作为背景资料出现。现如今结集成书,这些部分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整套书读下来会觉得稍欠整饬。我想,心科也一定对此有过顾虑,但全书的体例似乎又决定了倘若不如此处理,很多问题不容易解释清楚,这实属无奈。

不过,从没有哪项研究会十全十美的。心科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他能沿着自己开辟出来的这条道路,继续走得更远,走得更深。目送着自己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往前走,是作为一个老师最幸福的事情。

郑国民

2018.06.01

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或实行,标志着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百余年来,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应否或如何成为语文课程资源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周作人、叶圣陶等新文学家的大声疾呼下,翻译文学就曾大量进入过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但是随后钱基博、孟宪承、阮真等著名的教育学者就对此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又如,在始于1997年的那场被称为使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的语文教育大批判中,有人对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翻译文学数量过少、艺术性不强、写作时代偏古、题材及体裁单一、解读方式机械等问题进行了抨击,认为当时的教科书编者是在“阉割外国文学”,建议编者运用“世界文化”的眼光,至少选入80篇以上(达到已有篇数的4倍),以作品的艺术性而非思想性为选择标准,兼顾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出名和不出名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力求做到给中学生“一个比较成系统的世界文学的‘版图’”<sup>①</sup>。随后出版的多套新课标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多种风格、体裁的翻译文学作品。目前,翻译文学的教育功能的界定、选入数量的多少、文本呈现的方式、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等,还包括对翻译作品的评介标准的确立和翻译人员素质的要求等翻译文学教育如何实施,仍然是一个文学界和教育界无法回避而亟待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小学翻译文学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做一回溯,梳

<sup>①</sup> 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61页。

理其发展脉络,发掘其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等方面的基本做法,汲取经验,规避教训,为当下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提供参照或借鉴。

因为文学教育具有文化传承、情操陶冶、审美愉悦、语言习得、思维培育等多重功能,对健全人才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文学教育在本世纪初受到普遍的关注,人们开始对有关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文学教材的选文、文学教学的内容、文学教学方法、文学教学评价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具备上述教育功能,还能建构学生的国际视野,有利于培养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人才,所以翻译文学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前言中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开放的视野”,在“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中建议教材编者和任课教师补充推荐“外国优秀诗文”,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推荐的童话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及中外现当代童话等,寓言有《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有中外历史故事、中外各民族民间故事等,长篇小说名著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的《名人传》、高尔基的《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特别强调要推荐阅读“近年来发表的各类中外优秀作品”<sup>①</sup>。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中提出让学生“注意观察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化现象”;在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模块中提出要“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在选修课程“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三个系列中分别提出学生要“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培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小说、戏剧作品(包括影视剧本)的兴趣”,“阅读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作品”;在“附录”中的“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以及“选修课程举例”的“中外戏剧选读”“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列举了大量的经典翻译文学作品<sup>②</sup>。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2018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同样十分强调翻译文学教育。相应地,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中也选入了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

语文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对翻译文学教育的重视,必然使得有针对性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方式变得日益重要。前文提及,自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或实行而确立现代学制后,甚至早在1897年左右实行的新式蒙学中,翻译文学就一直被我国的中小学国文、国语学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28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10、11、28—29、30、31页。

当成一项课程资源在使用,如1901年南洋公学朱树人编订的《新订蒙学课本》已选入讲述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华盛顿》,又如1904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维乔、庄俞等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已选入乌鸦被狐狸欺骗的寓言《鸦好谏》等。翻译文学教育在整个20世纪前期共经历了清末、民初、新学制前后、新标准前后、抗战与内战时期五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学者对翻译文学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翻译文学的功用、数量、题材、体裁、国别、呈现方式等也均不太相同,翻译文学的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也有较大差异。对历史上有关翻译文学教育的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必然可为当前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参照,可为翻译文学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具有中外文学双重特征,其文本内容和艺术手法是外国(族)的,而语言表达形式却是汉文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教育者将其当成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来处理,教学采用的是母语教育的方式。如就清末民国国文、国语教科书中翻译文学选文的题材、体裁来说,小学低年级教材中的翻译文学多是以动物为题材的没有明显国别差异的寓言、童话,而小学高年级则出现篇幅较短的有外国人名、地名的小说、故事、传记,而中学则出现了篇幅较长的反映人生、社会问题的小说、剧本等。在选择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时,又各有侧重,如很少选择剧本,几乎不选诗歌。还有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虽然在不同阶段也不太相同,但所采用的都是那个时段的“国文”“国语”的“教授法”或“教学法”。研究这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教育方式、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则可提炼出汉语翻译文学教育特殊的教育方式、方法,相对于从西方移植来的教育方式、方法,可能更适合这种特殊的文本样式的教学,而达到预期设定的教学目标。

本书上编“经典翻译文学的接受与阐释”,从微观(点)上选择《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鲁滨逊漂流记》《最后一课》《项链》五篇(部)作品,先考察它们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与阐释,如教科书的收录情况,以及教育界、文学界等对其进行的异彩纷呈的多元阐释,除了呈现不同的观点外,还可为教材编选,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过程安排提供参考和借鉴。然后呈现丰富多彩的文本形式,如语体是文言或者白话,文体是小说或剧本等,形式是翻译或改编,全文或节选。

本书下编“翻译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面)梳理翻译文学教育在清末、民初、新学制前后、新标准前后、全面抗战与内战时期五个发展阶段的变化过程,呈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其在中国语文中是否应成为课程资源及其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功用、数量、题材、体裁、国别、呈

现方式等问题所存在的诸多争议,也为认识上编单篇作品的多元解读及其原因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

上下编结合,以做到点面结合、经纬交错地呈现翻译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

还在结语中总结清末民国翻译文学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结合现实探讨并设计翻译文学的未来发展路径。

希望本书能够为当前在制定或修订语文课程标准及编写或修订语文教科书时解决涉及翻译文学教育问题提供历史的参照,为一线教师解读翻译文学作品以及设计和实施翻译文学作品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并在作品解读、教学方法等方面提供切实的指导。

前 言 1

上编 经典翻译文学的接受与阐释 / 1

第一章 《皇帝的新装》的接受与阐释 / 3

文选一 皇帝之新衣 / 13

文选二 国王的新衣 / 15

文选三 皇帝的新衣 / 17

第二章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接受与阐释 / 21

文选一 卖火柴的女儿 / 36

文选二 可怜的女儿 / 38

第三章 《鲁宾逊漂流记》的接受与阐释 / 39

文选一 鲁滨孙 / 73

文选二 鲁滨逊漂流记 / 75

文选三 鲁滨孙漂流记 / 76

第四章 《最后一课》的接受与阐释 / 78

文选一 最后一课 / 127

文选二 一个老翁的自述 / 129

文选三 最后一课(剧本) / 130

第五章 《项链》的接受与阐释 / 133

文选一 项链 / 154

文选二 项圈 / 162

下编 翻译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 165

第一章 清末翻译文学教育(1902—1911) / 167

第二章 民初翻译文学教育(1912—1916) / 171

第三章 新学制前后翻译文学教育(1917—1926) / 174

第四章 新标准前后翻译文学教育(1927—1936) / 182

第五章 全面抗战及之后翻译文学教育(1937—1949) / 189

结语 / 193

参考文献 / 195

后记 / 207

# 经典翻译文学的接受与阐释

本编选择《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鲁滨逊漂流记》《最后一课》《项链》五篇(部)经典文本,先考察它们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与阐释,如教科书的收录情况,以及教育界、文学界等对其进行的异彩纷呈的多元阐释,除了呈现不同的观点外,还可为教材编选、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过程安排提供参考和借鉴。然后呈现丰富多彩的文本形式,如语体是文言或者白话,文体是小说或剧本等,形式是翻译或改编、全文或节选。

院内部使用



## 《皇帝的新装》的接受与阐释

“安徒生童话”现在几乎成了每个中国孩子的必读书目，其中的《皇帝的新装》几乎成为各套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固定篇目。

“皇帝的新装”的故事起源于古代波斯帝国(今伊朗)：一个皇帝雇了两个织工替自己织一种神奇的服装。织工称此服装的神奇之处在于智慧和忠君的人可以看见，否则看不见。国王派大臣们去参观，大臣们看不见，却不敢说，反而交口称赞。于是国王自己前去视察，但是他也看不见，也不敢说。新装织成后，大臣们附和着骗子称赞新装的精美，并和骗子一道帮国王穿上新装。在国王“着装”回宫的途中，百姓们夹道欢迎，称赞新装的精美。突然一个小孩嚷道：“国王并没有穿什么新衣呀！”于是，百姓们纷纷议论开了。但是，国王还是在群臣的簇拥下继续往前走着。

下面，我们先简介民国期间文学界对其翻译与语文教科书对其收录的情况，然后梳理、分析文学界与教育界对其主旨所作的阐释。

## 一、文学界的翻译与教科书的收录

### (一) 文学界的翻译

“皇帝的新装”这则故事经翻译传入我国，可能有以下两种途径：

1. 梁朝时以印度佛经故事的形式传入。梁朝的《高僧传》之鸠摩罗什传记中提到了盘头达大师所讲的一则



安徒生